

高校日常教育管理新论： 基于交叉思维的专题研究

Reinventing Daily Educational Management in Colleges:
A Monographic Study Based on Cross Thinking

姚会彦 陈 炳 高 猛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高校日常教育管理新论： 基于交叉思维的专题研究

Reinventing Daily Educational Management in Colleges:
A Monographic Study Based on Cross Thinking

姚会彦 炎刚 高猛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数据

高校日常教育管理新论:基于交叉思维的专题研究
/ 姚会彦,陈炳,高猛著.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3.1
ISBN 978-7-308-10917-8

I. ①高… II. ①姚… ②陈… ③高… III. ①高等学
校—教育管理—研究 IV. ①G64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97321 号

高校日常教育管理新论:基于交叉思维的专题研究

姚会彦 陈 炳 高 猛 著

责任编辑	陈丽霞
文字编辑	卢 川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杭州中大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德清县第二印刷厂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8
字 数	276 千
版 印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0917-8
定 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0571)88925591

序

教育首先应该关注的是人的本质、人的价值、人生意义等终极发展目标,它是以塑造和培养人的健全人格、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终极目的的实践活动。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教育具有乌托邦色彩的“终极完美状态”。但是,教育的终极目的不可能在一朝一夕或短期内彻底实现,它是一个持续发展、螺旋上升的过程,其中会遇到各种困惑、瓶颈、矛盾和挑战,每一位教育工作者都有责任、有义务为实现教育的终极目的而不懈努力、不断创新。

当前中国的高等教育正处于一个大发展、大调整的时期。从高校教育管理的对象来看,随着高校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特别是从“90后”成为高校的主力军以来,高教管理对象的多样性、异质性特征越来越显著,他们的教育需求和教育接受模式各有不同,且处于不断变动之中。这就为高等教育管理如何做到“以人为本”和科学发展提出了新的命题。高等教育管理只有尊重人的个体多样性,满足学生的发展需要,提升学生的精神境界,提高学生的道德品质,促进其思想政治素质、科学文化素质、身体心理素质、实践创新素质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才能彰显其存在的合法性和正当性。从高校教育管理的环境来看,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进程日益加快、信息网络化的普及应用和以争夺人才为核心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相互碰撞,一些有害社会思潮如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的传播,直接影响和腐蚀着大学生的精神境界,对大学生的理想信念、道德伦理、民族认同感等造成潜移默化的扭曲和侵蚀。另一方面,随着国内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和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社会环境对大学生的影响越来越大,这对高校教育

管理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高校教育管理工作要增强实效性、针对性和人文性,就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在内容、形式、过程、载体、方式方法等方面进行新的探索和实践。

作为高教管理重要组成部分的高校日常教育管理,具有一种“润物无声”的作用,它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和人才培养工作的一条重要途径。所谓“日常教育管理”,从根本上讲是对学生的教育与管理相互统一、相互促进,是“生活教育”哲学或“教育生活化”主张在教育管理实践中的应用、改造和发展。一方面,教育与管理是相伴而生的,好的管理本身对“人”具有一种教育、教化的功能,而教育又能够促进人本管理目标的实现。因此,无论是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还是人才培养工作,都要把对大学生的教育与管理有机结合起来。另一方面,高校的教育管理要回归学生的生活世界,首先应立足于提高学生的人际意识、社会意识和社会技能,帮助学生个体从困惑、疑虑及矛盾等现实生活问题中解脱出来,并获得社会生存和社会发展的本领。但是,高校教育管理又不能只停留在现实性、针对性和实效性的层面上,它还需要一份古典人文性、伦理性的关照,保持教育对生活的必要的超越,保持教育过程的必要的“迷魅”。只有这样,才能在实现现代高校教育管理的效率化追求的同时,又不失去教育管理自身的伦理关怀,最终促成健全个体的生成。

基于上述考量,浙江海洋学院的三位老师结合对大学生开展日常教育管理的实践,形成了《高校日常教育管理新论:基于交叉思维的专题研究》这本著作。该书汇聚了近年来笔者在国内刊物上发表的相关论文以及承担的相关课题的研究成果。三位笔者中的姚会彦老师现任浙江海洋学院管理学院辅导员、学工办副主任;陈炳老师现任浙江海洋学院管理学院党总支书记、副院长;高猛老师现主要从事公共管理教研工作。因此,他们都是身处一线、长期从事高校教育管理工作的“实战者”,本书的研究成果可谓是他们的切身工作经验之谈。此外,参与本书相关课题研究的还有浙江海洋学院的于淑文、乐芬芳、卢茜、郑琳、随付国老师,郑州大学的陈思坤、郭玉江老师,台州学院的金凌虹老师,浙江传媒学院的林毅老师,中山大学的陈兆仓博士,等等。因此,本书也是集体合作的成果,是对当前改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高校教育管理方式方法的一种理性的回应。

从研究内容和方法上看,本书主要具有两个方面的特色:

其一,本书的相关专题研究体现了“日常性”的特点。所谓日常性,也就是“回到人本身”,“回到现实的日常生活”。就“回到人本身”这层意义上看,本书所探讨的高校德育模式创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高校人才培养机制、高校教育管理体制、高校学生工作队伍、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六个方面的内容,都与大学生的成长、成才息息相关,且超越了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和专业教育的内容范畴。它首先回应的是如何使大学生“社会化”为一个健全、健康的和适应社会发展的人的问题,然后才是如何进一步促进大学生“政治社会化”和“综合素质提升”的问题。就“回到现实的日常生活”这层意义上看,笔者倡导在高校教育管理中引入“体谅关怀模式”,强化教育管理者与大学生之间的互构性、互动性、主体间性,突出了现实的日常生活对于教育内容、教育方式、教育载体形成的新影响和提出的新要求。总体观之,本书各部分研究内容既是相互独立的,又具有一定的内在相关性,体现了日常教育管理的实践与理论探讨的有机统一,体现了立足“现实的日常生活”与未来展望的有机统一。

其二,本书的相关专题研究体现了“创新性”的特点。尽管高校教育管理工作由来已久,但在本书的研究中,笔者努力通过新的内容、新的视角、新的方式加以论述。在研究内容上,本书侧重于当前学术界和现实生活中前沿性、焦点性问题,例如对大学生“耻感”教育的研究、对高校体谅关怀德育模式的研究、对网络与大学生政治社会化关系的研究、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体验式团体工作的研究、对高校学生工作者人际角色与技能的研究,等等。这些新的研究内容和视角,构成了本书作为“新论”的一个创新点。另一方面,本书的研究体现了“交叉思维”的特点。一是学科理论的交叉。笔者应用了教育学、伦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管理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理论知识,为相关专题的探讨奠定了立体的、坚实的智识基础,使研究视角更加丰富,研究范畴更显包容。二是研究方法的交叉。本书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冲破传统观念和条条框框的束缚,将质性研究与量化研究相结合,并针对不同专题内容运用了问卷调查法、历史研究法、比较研究法、案例研究法、系统研究法、心理研究法、行为研究法等研究方法,从而提高了研究的信度和效度,使相关研究更加科学,更有说服力。

当然,任何事物都是一个矛盾的对立统一体。本书除了具备以上特点之外,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作为一部“新论”,也就意味着它还有许多观点和内容需要商榷、需要争鸣、需要进一步改进和创新。因此,笔者期待并邀请更多的同仁加入这种商榷、争鸣、改进、创新的队伍中来。此外,作为一部具有“日常性”的教育管理专题著述而言,它又具有“杂论”的特点,在每一个研究内容之下,它都是“以点带面”的,还不够体系化,学理深度有待加强,因而它还存在不断拓展、深入挖掘、走向整合的可能性。尽管如此,笔者还是非常乐意把这些“杂论”以最真诚的方式呈现于读者面前,并衷心期待能够引发读者的共鸣或提出各种批评。尽管本书还存在一些不足或遗憾,但是,借用我国著名教育学家陶行知先生的话,“教育要通过生活才能发出力量而成为真正的教育”,作为教育工作者,笔者用他们最真实的言语和行动的力量来倡导“回归教育主体的生活”,这一点是值得肯定和借鉴的,也是弥足珍贵的。

高建平

2012年10月于浙江海洋学院

目 录

第一篇 高校德育模式创新专题	1
一、耻感教育:当代大学生道德建构的重要维度	1
二、高校体谅关怀德育模式的内涵及其实践探索	13
三、当代大学生婚恋观的不良倾向及其教育对策	27
四、当代大学生感恩意识的缺失与教育对策探究	35
五、高校学生德育目标与德育评价体系改革探索	40
第二篇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专题	51
一、网络对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影响与调控策略	51
二、思想政治教育的合法性:三维视阈下的证明	68
三、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评估体系的问题及其对策	73
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体验式团体工作的介入	88
五、后金融危机背景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创新	94
六、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问卷法及其功能定位	100
第三篇 高校人才培养机制专题	111
一、管理类大学生核心竞争力的培养与提升策略	111
二、高校行政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若干思考	118
三、高校校园危机视阈下学生干部领导力的发挥	127
四、社会学视阈下大学生就业难的原因及其对策	133

五、高校全程就业指导体系建构的若干问题简论	140
六、金融危机背景下大学生择业取向与政策认知	145
第四篇 高校教育管理体制专题	166
一、我国高校学生管理体制的问题及其对策探讨	166
二、以人为本:独立学院学生管理工作创新研究	172
三、我国高等教育体制之思:三维视域下的透析	179
四、网络社会背景下高校共青团工作的适应路径	185
五、多向性环境中高等学校学生社团的治理路径	193
六、高校领导的一种使命:创建高校学习型文化	198
七、高校教师职业枯竭与学校环境因素相关分析	203
八、学生党员的先进性与和谐校园建设问题探讨	212
九、高校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工作与和谐校园建设	218
十、地方高校体育人力资源优化配置与开发管理	224
第五篇 高校学生工作队伍专题	232
一、高校学生工作者的角色与人际技能新探	232
二、高校辅导员人格特质与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241
第六篇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专题	251
一、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调查分析:以河南为例	251
二、基于学习共同体的高校教师心理健康教育论	259
参考文献	265
后 记	278

第一篇

高校德育模式创新专题

一、耻感教育：当代大学生道德建构的重要维度^①

所谓“耻感”，是指人们按照一定的道德伦理标准评价别人行为或反省自身行为而产生耻辱的羞愧心理。这种羞愧心理包含了惭愧、内疚和悔恨。耻感不仅是一种普遍的心理现象，也是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核心要素，是“道德体系的原素和原色”，“几乎具有与伦理道德的文化生命同在的意义”。^②耻感教育作为一种心理和文化途径的统合体，理应成为当代大学生道德建构的重要维度。但是，由于我国传统文化的割裂和耻感教育的缺失、转型期社会道德评价和规范标准的混乱、高校治理过程中某些不端现象对大学生的消极影响等因素的共同作用，当代大学生耻感淡化，道德现状令人担忧，耻感教育的回归势在必行。在私德教育、公德教育和职业伦理教育中，高校应采取开放、互动、柔性、内化的模式，将耻感意识的培养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将耻感的心理和文化机制转化为大学生道德发展的建构工具，为社

① 本文原载《理论导刊》2008年第11期，题为《耻感教育：当代大学生道德建构的重要维度》；本文收录修订时参考了笔者的另一篇文章：《中国人的耻感与公民道德建构》，《哲学与文化月刊》（台湾辅仁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

② 樊浩：《耻感与道德体系》，《道德与文明》2007年第2期。

会主义和谐社会培育优秀的大学生公民。

（一）耻感教育的逻辑起点：心理与文化途径之统合

从逻辑起点上看，耻感教育的智识基础源于古今中外学者所进行的大量对于“耻”的研究，这些研究基于不同的框架、理论和模型，既有学理分析，也有实证检验；^①从研究定向上看，既有人格心理的微观描述，又有组织心理的中观阐释，还有哲学与社会文化视野中的宏观叙事。应该说，心理与文化途径的统合为现代道德教育提供了极为宝贵和值得挖掘的传统资源，并为道德建构的三个层面——私德、公德和职业道德领域的教育提供了逻辑起点和现实可能。

1. 耻感的心理镜像

古汉语中，“耻”字写作“恥”。《说文解字》曰：“辱也。从耳，心声。”《广韵》曰：“耻，惭也。”《集韵》曰：“耻，从辱。”《六书总要》曰：“耻，从心耳，会意，取闻过自愧之意。凡人心惭，则耳热面赤，是其验也。”可见，耻感属于人类最基本的心理经验之一，它的形成过程与心、耳、闻、思、止、惭等有关，通常伴随着紧张感、悔恨感和焦虑感，并通过人的内心感受引起行为的变化。

国内外学者的诸多研究成果与上述结论相互呼应。例如，谢夫对许多社会学取向的耻感观点进行了分析，他将耻感定义为一个“情绪大家族”（困窘、羞辱、羞怯、失败、无能），这个大家族通过一种“对社会契约的威胁”联系起来。^②波尔森则指出：“羞耻是一个经常被忽视和误解但却非常强大的促进因素。”^③从功能主义的观点来看，耻感是一种信号，它使我们避免那些可能导致它的行为——因为羞耻是令人痛苦的（即上文所说的“止”）。这一观点在一定

① 国内外学者对耻感的研究成果集中呈现于哲学、伦理学、心理学、社会学、精神卫生等领域。如：舍勒，1913；萨特，1943；本尼迪克特，1946；皮尔斯与辛格，1953；林德，1958；爱伯华，1964；威特金，1971；金耀基，1986；胡凡，1997；陈少明，2006；高兆明，2006等。

② T. Scheff. shame and the social bond: A sociological theory. *Sociological Theory*, 2000, 18 (1).

③ C. F. Poulson. *Shame and Work*. In N. M. Ashkanasy, C. E. J. Hartel & W. J. Zerbe (eds). *Emotions in the Workplace*. Westport, CT: Quorum Books, 2000, pp. 250—271.

程度上也表明,耻感可以被看成一种社会控制的机制。

笔者认为,耻感的心理机制包含“向外看——寻找差距”、“向内看——知耻改过”两个过程,它们相互联结、彼此呼应,可以称之为“双向度”。马克斯·舍勒从存在本体论的维度出发,认为羞耻感之所以发生,首先在于人是不同于动物的存在,人不仅有生命本能,还有精神;另一方面,人有羞耻感是因为人的精神能使人意识到自身与作为完满存在的“神”的差距。^① 克罗泽强调,在耻感的心理过程中,个体主要是通过自我来实现自我体验。他认为耻感主要依赖于三个因素:归因于他人、自己对行为的判断与对他人判断的知觉之间的对应关系以及被判断的自我内容(核心)。^② 从这个观点来看,当自我的核心内容受到质疑时(向内看),就会体验到羞耻,但是只有当个体采用了自身之外的其他的观点时(向外看),羞耻才会发生。

耻感的个体心理过程中包含着本我、自我、超我三者的关系。首先,耻感的素材来自于“本我”,它使人们彰显自己的本性,遵循“快乐原则”行事,于是人们显露出各种先天或后天的不足,甚至其行为会僭越社会能允许的尺度,这正是耻感发生的前提。其次,耻感产生的关键是“社会自我”(即弗洛伊德所说的“自我”)。这个阶段是“向外看”的过程,是自我反思的前奏,即通过向社会看、向身边看、向他人看、向未来看,来确定耻感的标尺,进一步激化耻感的产生。再者,耻感产生的终极指向是“理想自我”(即弗洛伊德所说的“超我”)。耻感正是产生于应然理想完满与实在的落差、矛盾或冲突,产生于本质要求与现实生活、本真意义与世俗存在之间的不和谐,^③正所谓由“思”而“耻”,“思”与“耻”一体,此为人之存在。

由此可见,耻感的心理机制包含“向外看——寻找差距”、“向内看——知耻改过”两个过程,体现了内省性与外生性的矛盾统一,我们可以称之为耻感

① [德]舍勒:《论害羞与羞感》,见《价值的颠覆》,罗梯伦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

② W. R. Crozier. Self-consciousness in shame: the role of the other. *Journal for the Theory of Social Behaviour*, 1998, 28 (3).

③ [德]舍勒:《论害羞与羞感》,见《价值的颠覆》,罗梯伦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

的“双向度”。“向内看”是耻感的本质,“向外看”是耻感的导火索。耻感既是主体对良心、完满、善的自我意识的过程,也是主体对自我进行反思反省的意识过程,两者浑然一体,闭合循环。缺少任何一个过程,都会使耻感脱离其本义,成为一种畸形的道德感。由耻感的“双向度”出发,我们可以进一步推演出道德教育的两个向度:从肯定性的方向看,我们可以选择积极倡导诚信、责任、博爱等正当价值的路径,促进道德情感向道德理性的转化,我们称之为“美德伦理”的建构;从否定性的方向看,则可选择外部控制规范以及引导人们知耻明耻、耻不从枉、祛恶从善的路径,我们称之为“规范伦理”的建构。道德建构应当遵循由“他控”到“自律”,由“规范伦理”到“美德伦理”的路线。^①

2. 耻感的文化镜像

耻感不仅是一种心理现象,也是一种本土文化现象。两千年来,儒家伦理文化支配和规范着国民的道德伦理行为,对塑造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其中沉淀着源远流长的耻感文化传统。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认为,与西方的“罪感文化”不同,东方文化是一种“耻感文化”。日本学者森三数三郎论述了“耻的文化”的真正发源地是在中国。^②

在中国的道德哲学体系中,儒家和法家代表了两大主流传统。在儒家眼中,中国人的耻感具有两层意义。首先,耻感作为个体的心理行为规范,具有道德内律的功能。两千多年前,孔子曰:“君子耻其言过其行。”(《论语·为政》)孟子曰:“耻之于人大矣。”(《孟子·尽心上》)明末清初的顾炎武也说:“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与友人论学书》)其次,耻感通过“家国一体”的传递和渗透,与国家治理发生联系,具有社会外控的功能。孔子曰:“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论语·泰伯》)他还说:“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齐国宰相管仲把礼、义、廉、耻称作“国之四维”(《管子·牧民·国颂》),顾炎武又明确点出,“四者之中,耻为尤

① 高猛:《中国人的耻感与公民道德建构》,《哲学与文化月刊》(台湾辅仁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

② 高猛:《中国人的耻感与公民道德建构》,《哲学与文化月刊》(台湾辅仁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

要”(《日知录·廉耻》)。可见,儒家所言的“耻”,体现了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统一性,也体现了“道德内律”与“社会控制”的统一性。

在“人性善”的假设下,耻感的逻辑起点是“从善”,是一个以肯定性的方式来把握“善”的过程,耻感正是通向“仁”之境界的必由之路。孟子曰:“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孟子·公孙丑上》)根据朱熹的诠释,“羞,耻己之不善也;恶,憎人之不善也”(《四书集注》)。也就是说,“羞恶之心”即羞耻感或羞耻心。孟子所说的“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属于道德情感,是“善”的种子;“仁”、“义”、“礼”、“智”属于道德理性,是“善”的果实。道德理性不能脱离道德情感,道德情感也需升华为道德理性,这是一个由情及理、连续发展的过程,正所谓“仁义礼智根于心”(《孟子·尽心上》)。从这一逻辑起点出发,儒家的道德教育主张“存心养性”,即保持人的天赋“良心”,尽力使之不受外界的不良影响,并通过“反求诸己”的方法,以“知耻”而修身,促进道德情感向道德理性的升华。

诸子百家中亦有不少人秉持“人性恶”的观点。荀子认为,人性就是“生而有好奇焉”,“生而有疾恶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荀子·性恶》),而人性之“善”则是后天人为(即“伪”)的。法家也很注意借用耻感进行国家治理。商鞅说:“夫刑者所以禁邪也,而赏者所以助禁也。羞、辱、劳、苦者,民之所恶也;显、荣、佚、乐者,民之所务也。”(《商君书·算地》)商鞅主张用刑罚来禁止奸邪,用官爵来劝励功业,其根据在于,人们的耻感会给人带来一种痛苦体验,促使人终止不当行为。可见,在“人性恶”的假设下,耻感的逻辑起点是“驱恶”,它颁布了道德的禁令,划清了善的底线,是一个以否定性的方式来把握“善”的过程。首先,“不知耻者,无所不为”(《魏公卿上尊号表》),耻感先是对“恶”的抑制,然后才是对“善”的激发;再者,“知耻近乎勇”(《礼记·中庸》),在“有所不为”的基础上,才可能进一步做到“有所为”。基于此,荀子提出了“化性起伪”的道德教育主张,他认为人的本性虽然是恶的,但是经过主

观的努力、“修身”和教化,也能改变自己的本性,成为道德高尚的人。^①

尽管各家的人性假设志趣殊异,然而他们均高度重视和强调耻感底线在抑恶扬善中的作用。法家以耻感来抑制恶行,其逻辑起点是“驱恶”;儒家则认为人可以“知耻而后勇”,耻感可以正面激发人的善良品性,最终使人达到“内圣外王”的修为与境界。总之,在传统道德伦理的大厦中,耻感是稳固而不可或缺的基石,耻感的缺失将是不可想象的。一个人知耻,便能主动而自觉地反省自身过失,把耻辱化为个人修身养性、不断进取的动力;一个群体、民族知耻,民众就能众志成城、同仇敌忾。正如清代思想家龚自珍所言:“士皆知有耻,则国家永无耻。”“厚颜无耻”、“恬不知耻”、“奇耻大辱”、“鲜廉寡耻”、“知耻后勇”等积淀于民族传统语言文化中的成语,反映了耻感是民族传统文化价值的一种支撑。以当代大学生为对象的道德教育,同样需要耻感的内化来筑起道德伦理的一道堤坝。

(二)耻感淡化与缺位:对当代大学生道德问题的审视

当代大学生群体的道德状况不容乐观,耻感淡化甚至缺失的现象表现得日益突出起来。对于什么事情与行为是可耻的,什么行为应当是可耻而禁止去做的,这些问题的原则和标准正在变得模糊不清。例如,作为大学生,考试作弊无疑是可耻而应拒绝的行为,然而一项调查显示,^②尽管多数同学认为考试作弊等行为破坏公平竞争秩序,但还有 29.69% 的学生认为作弊“虽不好,但可以原谅”,还有 10% 左右的学生认为这是“对不合理的学习内容或考试制度的反抗”,并表示自己也会这样做。这仅仅是在调查过程中的表示,实际考试过程中究竟有多少人会在受惩罚的成本较低的情况下选择各种形式作弊,其所占比重可想而知。甚至在一些学校,考试作弊呈规模化和群体化的发展趋势,这无疑是耻感文化的个人自律性作用丧失的表现之一。耻感的淡化还表现在诸如不择手段争取学校奖学金、各种学生干部地位、荣誉称号等个人利

① 高猛:《中国人的耻感与公民道德建构》,《哲学与文化月刊》(台湾辅仁大学学报)2009 年第 5 期。

② 参见谷峰:《大学生思想道德状况的五个特征》, <http://www.edu.cn/20050307/3130390.shtml>。

益的行为;逃课、迟到成为流行风气;高档消费等领域的攀比心理普遍存在、愈发显化;课桌、图书等公物损坏严重,等等。

在公德领域,大学生群体中所表现出的爱国主义、竞争进取精神等仍是值得肯定的主流,道德体系彻底败坏和堕落的只是大学生群体中的少数。但是,不得不承认,作为未来中国社会的中坚力量 and 建设者,主流大学生群体的耻感底线日益模糊,这一群体的耻感淡化和缺失无疑使未来社会道德体系建构蒙上了一层灰色,令人忧虑。

那么,造成大学生群体耻感淡化的原因何在?我们认为,这一问题是中国处于剧烈变革背景下的一个综合性问题,其形成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传统文化的割裂和耻感教育的缺失

许多学者认为,古代中国一脉相承的耻感文化传统,曾广泛而深刻地塑造了中国人根深蒂固的羞耻观念,发挥出对人的道德行为强大的控制作用,但在封建社会后期却逐渐走上成为戕害自然人性、存天理灭人欲的不归路。^①近代中国积贫积弱,备受列强欺凌,各界的爱国志士和知识分子把中国落后的根源指向传统儒家文化。五四运动以后,儒家伦理学说便作为“封建思想残余”遭到了数次猛烈的否定、批判和清除。这种矫枉过正式的价值观念解构带来的影响是深刻和久远的,其反对封建旧社会的积极意义自然无需多言,然而旨在重建中国人精神和社会伦理的各种文化运动,其效果却不尽如人意。由于迟迟未能出现全面有效替代儒家伦理的新型道德约束体系,社会道德信仰出现了真空状态。与此同时,传统文化的教育内容也在高校教育中被压缩和轻视,取而代之的是意识形态色彩较为浓厚的思想政治教育,道德教育仅作为其中的附属物而被简单灌输。

于是,耻感观念和相关的文化传统也就逐渐远离了普通民众,有关传统耻感文化的系统教育发生断裂,十年“文革”更成为破坏中国人道德规范和伦理

^① 有学者指出,儒家刚性的伦理规范趋于僵化和缺乏弹性,追求普遍有效性,即想制定一些在任何条件都不容许有例外的道德律令,并促使我们的意志敬畏它。这种社会外部控制的单向度强势引发了愈加严苛腐朽的清规戒律,依靠内心自律的耻感特征逐渐削弱,外部他律与内部自律之间出现断裂,使得传统伦理对健全人格的塑造功能严重丧失。参见詹世友:《公义与公器》,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

观念的一场文化浩劫。所以对于多在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生的大学生而言,以耻感文化来规范自身思想和行为也就无从谈起。

2. 转型期社会道德评价和规范标准的混乱

20 世纪 70 年代末,中国开始了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和社会变革,计划、管制、封闭型社会开始向市场化、开放化社会过渡。这场变革带来的对社会各阶层的经济、社会地位的影响和对大众心理的冲击力是持续而深刻的。人们对自身私利的追求逐渐压倒其他价值目标,成为人们的首要行为逻辑。随着经济利益结构的分化,不同地域、阶层、经济收入和文化程度的群体的价值观和道德选择不断分化,社会整体而言出现了道德标准的混乱和共同道德底线的缺失。道德的缺席“使人们的原生欲望未能受到理性规范和控制,由极度压抑、收缩到极度放纵、膨胀,导致了普遍的行为失范”^①。近来不断有涉及道德领域的问题上升为民众在公共空间里的争论,如伪造华南虎照片、艳照门事件、四川汶川大地震中的教师范美忠事件等引起的广泛争鸣,某种程度上正是社会不同群体共同道德标准混乱和差异的体现。

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中详细分析阐述了新教的伦理规范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兴起和市场经济发展的影响,作者得出了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与新教伦理有着一种内在的亲关系的结论。比较而言,尽管儒家学说的部分范畴对于市场化社会颇具价值,^②也有许多学者尝试重新解释或改造传统的儒家伦理以适应现代社会需要,但至少在实践层面上,还未能出现对传统伦理观念的有效整合,更难以在市场体系中规范不同利益主体的行为。同时,中国市场体制的发展存在以国家和政府为主导的鲜明特征,行政权力参与乃至控制各种资源的配置,由此权钱交易、权力寻租等负面现象开始滋生。这些社会转型中显现出的公平、民主和法治方面的不足,对各个群体的道德观必然产生各种负面的冲击。法治和实际规则的匮乏导致不择手段谋取利益的惩罚成本极低,理性经济人自然会摆脱道德和规则的约束,转而疯狂追求

① 强以华:《儒家伦理与市场经济》,《哲学动态》2004 年第 12 期。

② 张彩凤、翟德平:《当代中国人耻感淡化的原因及治疗对策》,《中华女子学院山东分院学报》1999 年第 2 期。